

● 政治学理论

论政治现代化的模式^{*}

施雪华

(武汉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施雪华(1963-), 男, 浙江嘉兴人, 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 法学(政治学)博士,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现代政府与政治、中外政党政治、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研究。

[摘要] 根据既有的各种政治现代化模式, 从动力、次序和过程三个不同的标准或视角来看, 至少在理论上存在14种可能的政治现代化模式, 当然, 政治现代化的模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每个国家只有选择了一条适合本国独特历史与现实发展可能性的政治现代化道路, 才有可能顺利实现从传统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系的转型。

[关键词] 政治; 现代化; 模式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999(2002)06-0714-07

由于各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状况的差异, 各国在从传统政治形态向现代政治形态转变过程中, 会在动力或阻力及其要素结构、要素关系、转变路径及其依赖程度、转变条件及其相关性、转变过程的时间性、空间性及由此而来的阶段性等方面, 显示出众多的差异, 从而形成了各国政治现代化的种种不同模式。如何分析这些不同模式? 这些不同模式之间究竟有何异同? 原因是什么? 本文将在介绍和评述各种理论观点的同时, 提出自己的一管之见。

一、既有模式

一般认为, 从传统政治形态向现代政治形态转变的过程即为政治现代化。然而, 一个政治体系是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的? 人们对此看法并不相同。

巴林顿·摩尔在其《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通过详细的历史研究, 认为通向现代社会的三条政治道路或曰三种政治模式为: 一种是以英国、美国、法国为代表的“暴力革命+改良主义”的“渐进式政治现代化模式”; 另一种是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法西斯主义+改良主义”的“曲折式政治现代化模式”; 再一种是以俄国为代表的“农民暴力革命+极权(或集权)主义”的政治现代化模式。至于是否有可能存在第四种政治现代化模式, 即“非暴力革命+改良主义”的“印度式政治现代化模式”, 摩尔本人也认为很难说^[1] (第334-335页)。

布莱克在《现代化的动力: 比较历史研究》一书中以他自己提出的从一个社会中政治权力从传统人物转入现代化领导手中相对于其他社会是早还是迟; 对传统领导直接的现代性政治挑战是内在的还是外来的; 该社会在近代是否拥有领土和人口的历史延续性, 抑或是经历了基本的人口和土地的重组; 该

社会在近代是自主统治还是经受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殖民统治；该社会进入近代时是否已在相当程度上发展出能适应现代性功能的制度，抑或根本缺少这种制度而需要从较现代社会引入等“五项标准”来衡量各个政治体系的现代化进程，从而提出了“七种政治现代化模式”^[2]（第87-115页）。

中国现代化研究著名学者罗荣渠先生在其《现代化新论》一书中把政治现代化看做整个社会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他概括的现代化模式主要有四种：一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市场+分权型或集权型现代国家机构”，它以英国为典型，大多数西欧、北美和原来英国自治领地区国家基本上属这种现代化模式。另外一种“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指令与有限市场结合+集权型现代国家机构”，它以前苏联为典型，50—70年代的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均属这种现代化模式。再一种是“混合经济+自由市场+集权或分权型现代国家机构”，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采用这种结合了前两种模式特征的“第三种模式”^[3]（第150-161页）。他在后来的《现代化新论续篇》一书中又提出第四种新的模式：东亚现代化模式^[4]（第69-70页）。他认为，东亚的现代化具有共同特征：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突入，使东亚被逐步纳入了以西方为中心的新的世界体系，于是东亚才被卷入了世界巨变的大潮，开始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世界的新的社会经济体制缓慢转变的过程，也即从自身衰败化、边缘化与半边缘化，走向革命化和现代化。不过由于前面的三个进程的程度各国有所不同，从而出现了基本相同，但各有区别的日本型、韩国型、中国型、混合型（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特殊型（城市型，即新加坡）等五种不同类型的东亚现代化模式。

另一位中国现代化研究学者钱乘旦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一书中把世界各国政治现代化的模式概括为四种：一种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渐进发展”的政治现代化模式。北欧国家、低地国家和原英国殖民地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均属此类模式。另一种是以法国为代表的“跳跃发展”的政治现代化模式。此外，俄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的政治现代化也属此种模式。再一种是以德国为代表的“被动发展”的政治现代化模式。与此相仿，意大利和日本也走了类似的政治现代化模式。最后一种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跳跃发展与渐进改革、被动发展可能并存或交替存在的“复杂发展”甚或全面创新的“全新发展”的政治现代化模式^[5]（第126-161, 208-223页）。

上述几种政治现代化模式，是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去审视政治现代化而得出的。对于我们分析世界各国的政治现代化问题，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和参考价值。

然而，各种分析模式均有自己的不足之处，在摩尔的分析模式中，缺少了对东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新模式的概括，同时，将中国与俄国的模式概括为“农民革命+极权主义”模式，似乎并不完全符合中俄两国，特别是俄国的情况。布莱克的分析模式忽视了普通公民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影响和作用。罗荣渠先生的分析模式不仅仅是专门针对政治现代化的，而是一种包括政治现代化的广义的社会现代化模式的概括。钱乘旦的分析模式抓住了以英、法、德三国为典型的政治现代化模式之间的根本特征之区别，但它存在两个基本缺陷：一是从历史事实的角度看，用“渐进发展”、“跳跃发展”和“被动发展”去概括英、法、德三国及与此类似的其他国家的政治现代化模式，有将复杂的事物简单化了的不足，也即英国不仅有“渐进发展”，也有“跳跃发展”，法国不仅有“跳跃发展”，也有“渐进发展”，德国虽然主要是“被动发展”，但也有“主动发展”的动力和过程。

二、理论模式

从理论逻辑角度看，我们认为至少存在三组可能的政治现代化模式。理由是，对传统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系转变，可以从动力、次序和过程三个不同的标准或中轴去考察研究。

从动力的标准去分析，我们可以把政治现代化划分为内生型、外植型和内外结合型三种模式。所谓“内生型政治现代化模式”的基本特征是：一国或地区政治现代化的动力主要来自该国和地区社会内部，其特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造成了这三个子系统之间的某种特定的张力。这种特定的张力经长期

的历史运演,积淀到一定程度,就会要求其政治系统发生质的变化:其政治体制从传统走向现代。可见,内生型政治现代化一般是从本国本地区的历史和现实中经长期的自然历史过程慢慢达成的。虽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现代化也有可能受某些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但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不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政治现代化的主要动力之源。而“外植型政治现代化模式”的基本特征是:本国本地区的历史和现实中没有或少有政治现代化的动力,其政治现代化的动力主要来自该国或该地区的外部环境的压力。也就是说,在某个特定的历史和现实条件或环境下,某国或某地区的外部环境强烈要求改变该国该地区的政治体系的性质: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于是,在外部环境系统的直接压力甚至直接主导下,该国或该地区在较短的时间内不得不接受外部强加给它的现代政治体制。所以,其现代政治体制主要不是经长期的历史运演从自身的历史和现实中自然生长出来的,而是由外部“人为移植”的。所谓“内外结合型政治现代化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其政治现代化的动力既来自该国或地区社会内部,也来自该国或地区社会外部,且这种内外压力的强度基本相等。在内外两种压力共同作用下,政治体系逐渐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内外结合型政治现代化模式”在长期的自然历史过程中有可能以内部压力为主,后来在较短的历史时期里以外部压力为主完成政治体制的转型。也有可能在长期的自然历史过程中以外部压力为主,但在某个特定的较短历史时期里,以内部压力为主,完成政治体制的转型。可见,所谓“内外结合型政治现代化模式”,其内部和外部两种压力的量度并非在任何时期都是绝对相等的,而是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压力为主,甚至有可能出现不同的压力波浪式交替为主次的情况。

从次序的标准去分析,我们有时间和空间两种不同的次序视角。

首先,从时间次序上,我们可以把政治现代化划分为先发型和后发型两种不同的模式。所谓“先发型政治现代化模式”是指,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现代化在时间上大大领先于别国、别地区。因此,它们具有某些相同或类似的原生性共同特征。而“后发型政治现代化模式”是指,受到已经基本完成的先发型政治现代化模式的影响,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现代化才开始。因此,它们也有某些相同或类似的次生性共同特征,而这些特征与“先发型政治现代化模式”又有鲜明的不同。“先发型政治现代化模式”一般具有较多的“原创性”(较少或没有仿效别国、别地区的做法)、“内生性”(主要动力来自该国或地区社会内部)和“独特性”(各国、各地区的政治现代化模式、动力、次序和过程常常很不相同或差异较大)。而“后发型政治现代化模式”一般具有较多的“仿效性”或曰“追赶性”(仿效先发国家和地区现存的模式,追赶先发国家和地区现存的各种指标)、“外植性”(主要动力来自该国或地区社会之外的示范效应和巨大压力)和“近似性”(各国、各地区的政治现代化模式、动力、次序和过程往往相近、类似,甚至相同)。

其次,从空间次序上,我们可以把政治现代化划分为欧美型、苏东型、德日型、北欧中欧型、东亚型、中国型和其他型等七种模式(详见下一目“实践模式”)。

从过程的标准去分析,我们可以把政治现代化划分为渐进型(改良型)、突变型(革命型)和渐进突变结合型(改良革命结合型)三种模式。所谓“渐进型”或“改良型”政治现代化模式的基本特征是:经过长期(上百年或几百年)点滴的改良的累积,从原有的传统政治体制中逐渐生长出一种既与传统政治体制密切相连,但又在质上不同于传统政治体制的现代政治体制,或者说,在新的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中保存了大量旧的传统的专制政治体制的形式或结构,但其内容或精神已是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在新旧政治体制连接与更替过程中强调历史的连续性、传统的继承性的重要性,很少有或没有革命和暴力,主要靠大量小的甚至不起眼的,常被人误认为保守的、“反动的”、和平的改良政策和措施,一步一步地缓慢地达成变革目标。“突变型”或“革命型”政治现代化模式的主要特征是:经过特定时期或连续不断或波浪式的暴力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对抗和冲突,在较短时期内造成传统政治体制的崩溃或消失,现代政治体制的成长和巩固等突变性历史现象。在新旧政治体制交替更接过程中暴力和革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激进的“革命的”政策和措施常常以传统政治体制的对立面的面目出现,否定历史的连续性和传统的继承性的重要性,强调时代性和创新性。所谓“渐进突变结合型”或曰“改良革命结合型”政治现代化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在从传统政治体制向现代政治体制转型过程中,改良和革命两种动力均起了重要作用。或

者两种动力先后作用,或者两种动力交替作用,波浪式推进政治体制的转型。因此,这种模式的政治体制转型既靠长期的、和平的、点滴的改良政策和措施的累积,也赖短期的、暴力的、瞬间的革命行为和措施的推进。在部分改良和部分革命的情况下,一部分历史 and 传统体制得以在新体制中保存下来,而另一部分历史 and 传统体制不得不在革命和暴力中退出历史舞台。所以,现代政治体制是继承和创新综合的结果。

上述各种分析模式提供了人们分析政治现代化的多种独特的视角,因而,对历史上和现实中存在的各种政治现代化情景均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如果对照历史事实的话,我们发现,没有一国或一地区的政治现代化纯粹属于其中一种模式。所以,我们只能在上述各类理论或逻辑模式中挑选一组相对而言比较接近于各国各地区政治现代化的历史与现实的分析模式,去分析实践中的各国各地区政治现代化模式。

三、实践模式

经过综合分析,我们认为,从空间次序去分析各国各地区政治现代化模式比较接近各国各地区政治现代化的历史和现实。

若从空间次序上去分析政治现代化,我们可以把政治现代化划分为欧美型、苏东型、德日型、北欧中欧型、东亚型、中国型和其他发展中型等七种模式。

欧美型政治现代化模式主要盛行于西欧和北美。其基本特征是:以个人自由与权利(利益)为核心,以自由和平等为主要价值取向,以法治、分权、多党制(广义的多党制包括两党制)为基础,逐步建构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就这种模式的动力看,是资产阶级暴力革命加资产阶级和平改良。就这种模式的过程而言,实际上是渐进突变相结合。由于“欧美型政治现代化模式”是建立在个人自由与权利(利益)基础上的,而个人的经济利益之间总是有差别的,文化上个人自由和平等是为求得人们之间有一种相同的权利去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的价值观反映,而政治上的自由与平等而非特权与等级给了这种经济现实和文化观念提供了一种相应的形式上的条件,即至少政治体制提供了人们追求不同的有差别的经济、文化利益的相同的无差别的政治条件。所以,“欧美型政治现代化模式”的实质是以现代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或程序民主去取代封建的实质专制和等级特权。

“苏东型政治现代化模式”的典型是前苏联和东欧各国。这种模式的基本特征是:以集体权利或整体利益为核心,以经济、文化上的绝对平均主义与政治上的特权等级制结合为主要价值取向,以人治、集权和一党制为基础,建构现代共产主义式“民主政治”体制。这种模式的动力是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在武装夺取政权之后,依靠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国家政权和军队,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等剥削阶级展开不断的斗争,不仅从所有制形式上,而且还从组织结构,甚至人身形态上,消灭剥削阶级及其成员,从而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这种模式的过程是突变革命与渐进改良相结合。短暂的暴力革命摧毁了旧的国家机构和旧的政治体制,初步建立起共产主义式“民主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的基础是人治、集权和共产党一党制。然后通过长期的和平的渐进改良政策和措施(如新经济政策、国有化政策等),逐步巩固共产主义式“民主政治”体制。当这种体制因国内外阶级斗争或党内斗争而出现某种“危险”时,就会开展短暂的暴力革命式的“阶级斗争”,从而巩固共产主义式“民主政治”体制。由于这种政治体制是以权利为核心,提倡“集体权利”或“整体利益”,所以常常具有比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更“民主”的现代民主政治的形式“外壳”,而缺少现代民主政治的实质内容。原因在于,经济、文化上的绝对平均主义与政治上的特权等级制是一种看似很不协调,实则非常和谐的组合。经济上如果不是平均主义的,那么,就必然有经济利益上的差异,经济利益上的差异必然要反映到思想文化意识上:个人自由与权利至上,进而要求政治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即平等参与政治的权利,从而保护各不相同的经济、文化利益。相反,经济上是平均主义的,经济利益的差别几

乎为零,思想文化意识上才有可能是整体主义(假借“集体主义”)的;没有个人利益差异是真正的整体主义的前提。经济上的平均主义与文化上的整体主义(虚假的集体主义)一旦结合,就要求政治上有保护经济平均主义和文化集权主义的整体主义象征和体制,而政治上的人治、集权和一党制就正好是达成这种经济文化价值取向的最佳政治形态:人治、集权和一党制都是以整体主义为理论依据的。正因为如此,这种“共产主义式”现代民主政治体制是脆弱的:当执政党及其最高领导人本身还很“民主的”时候,这种体制确有现代民主的实质内容。当执政党及其最高领导人走向个人独裁和一党专政时,这种体制就不再有现代民主的实质内容了^①。正因为这种类型的民主政治体制具有脆弱性,因此,当其走向民主的反面后,公民对这种体制的认同度就会急剧下降。冷战结束后,这种体制就日益失去存在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之后,这种体制就被西方式民主政治体制所取代。但西方式民主政治体制一方面有一个如何适应前苏东地区的历史与文化问题,即西方体制的苏东化问题。另一方面还有没有可能从其实践中生产出一种土生土长的既不同于西方式民主政治体制,又不同于“原苏东式民主政治体制”的新型的现代民主政治体制。这些目前尚难定论。

“德日型政治现代化模式”的代表是战后的德国和日本。这种模式的基本特征是:以欧美的个人自由和权利为核心,以自由和平等为主要价值取向,以法治、分权和多党制为基础,建构现代欧美式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这种模式的动力是外来的民主化压力。二战结束后,鉴于对德、日法西斯主义的戒心,西方盟国将自己的欧美型民主政治体制强制性地移植给德国和日本。虽然,在德国和日本,对于强加给它们的欧美型民主政治体制是有抵触情绪的,但在强大的外在压力下,同时结合自己历史上民主制失败的教训,它们也被迫接受。这种模式的建构过程是外来体制逐渐与本国历史文化衔接和内化的过程。“德日型政治现代化模式”在战后初期从形式上看是外来的、移植的,但从后来的发展过程及内容上看,德、日的政治现代化又是历史的、内在的,即与其本国的历史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而且,随着本国政治体制的现实发展,外植的政治体制越来越具有德国和日本政治自身的特色,最后形成了不同于欧美型民主政治体制的德日型民主政治体制^②。这种体制将随着这两国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向前推进,会越来越德国化和日本化。然而,这两国政治体制的德国化和日本化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还是不利于其本国政治形态的现代化或后现代化,它需要时间的澄明和历史的检验。

“东亚型政治现代化模式”的典型是韩国及东南亚非社会主义各国和地区。这种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在内部和外部双重压力下,以新权威主义为价值取向,即经济上实行自由市场,而政治上实行专制集权,开始政治体制的缓慢转型。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政治不再能给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时,政治体制通过内部改革开始从专制集权大规模向民主分权方向发展,最终其政治体系将从传统专制极权统治走向现代议会民主政治。这种模式的动力既有外来的民主化压力,也有内部改革的要求。外来的民主化压力主要是二战后西方国家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政治的影响,而内部要求则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公民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产生的要求保护自己合法利益的政治要求。这种模式的建构过程是长期的和平改良为主,兼有短暂的流血冲突和革命风暴。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公民在长期的专制极权统治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民主化斗争(运动),迫使本国的统治者进行缓慢的点滴的政治改良(如普选权的扩大、公民权利制度的健全、党禁的开放、个人独裁的终结等)。当这种点滴的政治改良跟不上经济自由化带来的对政治体制民主化的要求速度,经济与政治矛盾日益加剧时,政治现代化就会出现质的转折,即伴随着短暂的或间隔的暴力冲突,大规模的政治民主化到来了。这时,西方式的议会民主政治和多党竞争制度等就会逐步建立起来。当然,由于长时期的民主压抑,当政治民主化浪潮突然到来时,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就会面临严峻考验。一方面,选择西方民主政治体制中哪些方面是合适的;另一方面,如何完善这些国家初建的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以提高这一体制本身的运作能力,包括对日益高涨的公民政治参与的容纳能力;再一方面,西方式的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与本国的历史和文化的冲突与摩擦问题,促使人们思考如何使两者有机地融合而产生一种具有本土根基的东方式或东亚式民主政治体制,即东亚民主政治体制的本土化问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问题仍然困扰着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现代化

向纵深发展^③。

“中国型政治现代化模式”的代表是中国大陆。这种模式的基本特征是：以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摧毁旧的专制极权政治体制，然后通过长期的和平改革（包括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等）建立起以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价值核心，以人治与法治、集权与分权、一党领导与多党合作结合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这种模式的动力是革命与改革的结合。这种模式的建构过程也是突变式革命与渐进式改革相结合。这种体制有其脆弱性，故当党内和外部（国内和国外）的阶级斗争形势紧张时，常常要采取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来巩固这种体制。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外压力将会更大。一种新型的、不同于建国初、更不同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正在真正的渐进建构中。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将建立在尊重个人自由与权利，并与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价值紧密结合在一起，从人治渐进走向法治，从集权渐进走向平衡，从一党制（文革期间）走向真正的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的基础之上。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决不同于欧美型，也不同于苏东型，更不同于东亚型和其他型。这确实是一种吸收了人类所创造的各种民主政治的精华，同时，又结合中国国情（历史与现实）而创造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政治现代化模式^④。

“北欧中欧型政治现代化模式”的典型是北欧的瑞典和中欧的瑞士、奥地利等国。这种模式的基本特征是：通过体制内外的协商，各派政治力量达成了政见的基本统一和谅解，然后，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又紧密合作，从而促成政治体制和平、稳定地发展。这种模式的动力是合作互谅精神，而过程是长期的和平的改革。在瑞典，这种政治现代化模式被称为“协议民主制”。在瑞士，这种政治现代化模式被称为“协商一致民主制”。在这种体制下，进入联邦政府和联邦议会的各党经常就某些有分歧的问题进行讨论协商，尽可能取得一致意见，然后再付诸公民投票，这样的提案由于本身就综合了各种党派的意见，考虑到了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很容易为公民表决所通过。在奥地利，政治现代化的模式被称为“联合民主制”或“均衡民主制”。奥地利社会党、人民党和自由党等政党经常通过政治谈判，在按比例进行均衡分配的基础上达成一种比较克制的态度，按本党的实际势力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尽量避免相互间的政策和意识形态冲突，用商议、忍让和妥协来代替争吵、攻击和对抗。战后奥地利政治就是在这种相互协议和合作中逐渐走向现代民主的^⑤。

“其他发展中型政治现代化模式”的代表是亚非拉一些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这种模式的基本特征是：以基本人权即生存权与发展权为基础，以承认并尊重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前提，在不断的内部冲突中努力整合各种松散的氏族、部落组织为一个相对紧密联系的民族国家整体，建构基本的国家机关和治安体系，使该国缩短多个发展阶段而走上现代政治的发展之路。这些国家实际上大多是一些松散的氏族或部落联合体，而非紧密的国家实体。

以上我们从理论逻辑和历史实践两个方面分析了政治现代化的各种应然模式和实然模式。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政治现代化的模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每个国家只有选择了一条适合本国独特历史与现实发展可能性的政治现代化道路，才有可能顺利实现从传统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系的转型。而所谓“现代政治体系”虽然有一些基本衡量指标，但也并非每个国家的政治体系均是整齐划一、完全相同的。所以，政治现代化模式实际上是各国传统政治通过体制转型来更适应特定历史和文化环境中的一部分（该国、该地区）现代人的生活的一种政治体制形式变迁的道路或途径。与政治现代化内含的价值相比，政治现代化模式本身只是达到其价值的工具和手段。

注 释：

① 参阅[美]布莱克等：《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日]田口寅久治等：《当代世界政治体制》，耿小曼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② 参阅[德]库特·宗特海默尔：《联邦德国政府与政治》，孙克武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丁建弘等主编：《战后

德国的分裂与统一》，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蒋立峰主编：《日本政治概论》，东方出版社 1995 年版。

- ③ 参阅[美]路辛·W·派伊：《东南亚政治体系》，李伟成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91 年版；张蕴岭主编：《亚洲现代化透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 ④ 参阅[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马立诚、凌志军：《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8 年版。
- ⑤ 参阅[瑞典]斯·哈登纽斯：《二十世纪的瑞典政治》，戴汉笠等译，求实出版社 1990 年版；他石：《瑞士联邦 700 年》，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0 年版；陈林：《战后奥地利政党政治评述》，《西欧研究》1992 年第 1 期。

[参 考 文 献]

- [1] [美]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M]．拓夫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 [2] [美]西里尔·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M]．景跃进，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 [3]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 [4]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 [5] 钱乘旦，等．世界现代化进程[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 叶娟丽)

On Patterns of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SHI Xue-hua

(School of Politics &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SHI Xue-hua (1963-), male, Doctor,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School of Politics &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political theory, moder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comparative party politics,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theoretically at least 14 possible patterns of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according to three different standards or perspectives, if we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all the patterns already in existence. Of course, patterns of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may vary. Only if each state chose an appropriate approach to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suited to its own special history and the possibility of its actual development can it bring about the transition from a traditional political system to a modern one.

Key words: politics; modernization; pattern